

我国不断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助推创新驱动发展

为“知识防盗”筑牢法治屏障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举措,不断激发创新活力,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护,无不需要知识产权制度保驾护航。2014年,经中央批准,北京、上海、广州成立了中国第一批知识产权法院,奠定了中国特色知识产权专门化的审判体系...

作,以及全社会对创新文化的认识和知识产权意识的提高。”郭泽强说。

我国司法保护不断加强 依法宣判彰显保护决心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作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重要力量,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到,2020年全国法院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46.6万件,同比上升11.7%...

权利人负有举证证明其产品来源地的责任,且即使来源地属实,被控侵权人还必须举证证明其系对该证明商标中地名的正当使用。

此外,近年来,我国人民法院还审理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广泛影响力的案件,如乔丹商标系列案、红牛商标权属案、华为公司与康文森公司系列案、“香兰素”技术秘密案、砖瓦协会垄断案等,彰显了人民法院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坚定决心...

实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 保障创意经济持续发展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成果,关乎企业发展、人民福祉和国家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围绕“健全知识产权保护运用体制”提出了“实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知识产权”也再次成为高频热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再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代表委员们也为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研究员孙菊红撰文指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进一步认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坚定不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之路上迈出新的步伐,有利于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知识产权室主任管育鹰也认为,中国已经走到了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基于无形的智力资产的创意经济发展将有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也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增长引擎。若要保证创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运用和保护,建立回报机制,保证创意者的投入获得回报,实现市场均衡。

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乐高”诉“乐拼”系列标识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作出终审判决,认定“乐拼”生产厂商广东美致智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市智乐拼玩具有限公司等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且程度恶劣,判令其立即停止侵权、赔偿乐高博士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共3000万元。

这一判决结果,将一审判决的300万元提高了10倍。

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张书认为,上述判决的信号非常明确,表明中国政府重视国际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立场和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决心,提高损害赔偿金额,起到震慑作用,有力地打击了仿冒者,保护了权利人,给了市场很大的信心,对整个市场竞争环境有正面影响。

在另一起“乐高”案中,版权领域的保护也涉及了刑事责任。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主犯李某某侵犯著作权罪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9000万元,其余8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4年至6个月至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相应罚金。该判决已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据了解,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成立以来,截至2020年12月23日,共受理案件5104件,审结4124件。其中,受理民事二审案件2905件,审结2277件;受理行政二审案件908件,审结614件。

制图/李晓军



□ 本报记者 王阳

今天是第21个世界知识产权日。早在1月19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官方网站就发布了2021年世界知识产权日主题——知识产权和中小企业:把创意推向市场。

所谓知识产权,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科学技术方面或文化艺术方面,对创造性的劳动所完成的智力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知识产权包括工业产权和版权(著作权)两部分,主要包括商标权、专利权、版权保护以及对仿冒和损害商业秘密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禁止。

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刚需”、“国际贸易”的“标配”。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举措,不断激发创新活力,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水平全面提升。未来,我国将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大助力。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促进保护水平整体提升

早在1950年,我国就颁布了相关的知识产权法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我国基本形成了包括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等在内的知识产权法律框架。

1985年,“86100001.0”新中国第一件专利号产生,标志着“知识无价亦有价”的时代由此肇始。

此后30余年,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快速发展。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有效量达221.3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5.8件,累计批准地理标志产品2391个,核准专利标准使用企业9479家,累计注册地理标志商标6085件。

此外,国家知识产权局与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2019年全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数据公告》显示,2019年全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为114631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1.6%。

创新成果的转化运用,良好营商环境的营造,国际交往的顺利开展,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

动,标志着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正式建立,同时也意味着分散于全国各省份法院的知识产权二审(即终审)将统一审判标准。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甘绍宁介绍,国家专门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实现了商标、专利、原产地地理标志的集中统一管理,明确了知识产权保护“谁来干、谁负责”。

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明确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社会治理手段强化保护,促进保护能力和水平整体提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郭泽强认为,《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是首个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出台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纲领性文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和保护水平的全面提升。此前有观点认为知识产权保护主要是司法部门的事,该意见考虑到目前公众知识产权意识总体不高,侵权案件多发等现象,明确提出不能仅靠司法部门、行政、社会力量都必须参与。

“知识产权保护涉及多环节、多方面,不能靠某个部门唱独角戏,有赖于行政、司法、执法等部门及相关从业机构和行业协会的通力协

双方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二审认为,一审判决在确定侵权赔偿数额时未充分考虑涉案技术秘密的贡献程度,确定惩罚性赔偿时未充分考量侵权行为人的主观恶意程度和举证妨碍行为等,以顶格5倍改判安徽纽曼及相关9人赔偿经济损失3000万元及合理开支40万元。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胡功群指出,上述案件是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首例惩罚性赔偿案,判决充分考虑了被诉侵权的主观恶意、举证妨碍行为以及被诉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侵权规模等因素,适用了惩罚性赔偿,最终确定了法定的惩罚性赔偿最高倍数5倍的惩罚倍数,明确传递了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的强烈信号。

今年4月16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认定王某在被诉侵权商品包装上突出使用“阿克苏”标识,既未能充分举证证明被诉侵权苹果来源于阿克苏地区,对“阿克苏”标识的使用亦超出正当使用地名的范畴,构成“商标侵权”,判决撤销原判,改判王某、某水果店停止侵权,赔偿阿克苏地区苹果协会损失10万元。

该案判决时,距2021年世界知识产权日仅剩10天。

据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介绍,该案是一起成功的司法保护地理标志产品的案例,厘清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侵权构成条件,即被控侵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法治经纬

□ 本报见习记者 张守坤 □ 本报记者 陈磊

腐败,是古今中外的社会“毒瘤”。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系统中组建了纪检监察机构——中央苏区委员会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会,进行反腐倡廉工作的探索和实践,清除中华苏维埃的“毒瘤”。

1934年9月,《红色中华》刊文称:“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打响苏区反腐第一枪

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举行了一场受人瞩目的公审,公审的对象是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原主席谢步升。庭审结束,裁判部判处谢步升死刑。

谢步升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同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审理了谢步升案,认为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对谢步升的判决是正确的,决定按照原判执行。

当日下午,谢步升被执行死刑。党史资料显示,谢步升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个被执行死刑的腐败领导干部,此案打响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反腐败的第一枪。

查处谢步升案的机关,是1931年11月设立的中央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会,何叔衡是首任中央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会部长。在地方上,省、县、区各级工农民主政府下设工农检查部,乡和城市苏维埃下设工农检查科。

工农检查机关的职责是,监督苏维埃机关、企业及其工作人员正确执行苏维埃的政纲及各项法律、法令,保护工农群众利益,若发现苏维埃工作人员有行贿、浪费公款、贪污等犯罪行为,有报告法院,提起公诉等。

党史研究资料显示,工农检查机关的设立,标志着中华苏维埃监察制度的诞生,并承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部分反腐败职能。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授刘素华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了这一新机构设立的必要性。

刘素华认为,当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还受着旧思想、旧风俗势力的侵蚀,一些党员干部和工作人员抱着“开官发财”的思想混进革命队伍中,再加上制度不够健全,容易让腐败人员钻空子,腐败现象滋生蔓延。

谢步升即是其中的典型。

1932年2月,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收到一封群众的检举信,检举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时任主席谢步升有严重贪污行为。党史资料记载,谢步升从小家境贫困,12岁起给地主打短工,1929年参加工农武装暴动,任云集暴动队队长,1930年,谢步升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

经查,谢步升的贪污事实有:吞没公款3000多毫(毫子),强奸妇女多名,收受贿赂包庇富农,伪造证件私运水牛到白区出售,杀害并占有一位红军军医的金戒指和毫子等。

谢步升案件结案后,中央苏区的反贪风暴拉开序幕。

出台“训令”及系列反腐败法规

1932年9月初,在苏联学习的董必武回国后抵达瑞金。

1933年3月,董必武兼任中央工农检查部委员,开始从事惩治贪污腐败工作。

同年9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成立中央苏区各县县苏维埃委员会的决议》,《决议》指出:为防止党内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纪不遵守党的决议及官僚腐败等情弊发生,在党的中央苏区委员会未正式成立以前,特设立中央苏区委员会,各省委于最近召集的省苏级代表大会时选举省县级的监察委员,成立各省县监察委员会。

据此,中央苏区委员会及省县监察委员会的职责是,在以布尔塞维克的精神,维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正确的执行铁的纪律,保证党内思想和行动的一致,监视党和党的决议的实行,检查违反党的总路线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官僚主义及腐败现象等),并与之作无情的斗争。

中共中央任命董必武为中央苏区委员会书记,根据中央的决议,自1933年冬起,中央苏区所辖各省,县先后选举成立了监察委员会。

其间,何叔衡、董必武共同推动出台了一系列反腐败法规,包括《工农检查部的组织条例》《工农检查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33年12月,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制定的第一部完整的关于反贪污浪费的法律文献,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份反腐败的量刑标准。

训令规定: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

1933年底,何叔衡多个职务被免,随后,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会改为工农检查委员会,1934年1月,项英为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董必武兼任工农检查委员会副主席,挑起中央苏区反腐重担。

刘素华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健全反腐败法律法规,既为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依法推动了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有效打击了腐败行为。

查处“于都贪腐窝案”

党史资料显示,在中央苏区,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一批大案要案被查处,一批腐败分子被严惩。

震惊全党的“于都贪腐窝案”,就是中央苏区委员会成立后查处的最大一起贪污腐败案件,也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县级政权集体腐败案。

“于都贪腐窝案”的发现始于1933年底。当时,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工作组发现于都县各项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县委、县苏维埃主要领导对工作敷衍塞责,对群众利益漠不关心。

随后,中共中央苏区委员会与工农检查委员会派专人到于都县检查,认为时任于都县委书记刘洪清、于都县苏维埃主席熊仙壁有严重问题。熊仙壁还是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4年3月,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项英亲自带领调查组进驻于都,经调查核实,发现于都县党政机关领导干部集体腐败,各级机关贪污成风,一是造假账冒领公款,二是贪污公款做生意,三是贪污公款与公物。

中央苏区委员会决定对“于都贪腐窝案”中一些大案,要案进行公开审判。最终,多名领导干部被判死刑,多名相关人员受到了相应的处分。其中,熊仙壁先是被撤销中央执行委员和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接着由苏维埃最高法院判处监禁1年,期满后剥夺公民权1年。

在刘素华看来,刚建立的中华苏维埃政权,外部是国民党的围剿,内部是干部严重缺乏,面临这种情况,仍对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坚决依法审判,体现了我们党反腐败的坚定决心。“我们党通过反腐败斗争,保持革命本色,保持红色政党的性质,树立并巩固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让革命政权能够得民心、得长久。”

中央苏区依法反腐肃贪清除腐败“毒瘤” 探索建设“真正的廉洁政府”

感悟



4月21日,江西省新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开展警营开放日活动,邀请外卖小哥参观警营。此次活动结合文明交通出行,让外卖小哥与交警进行面对面交流互动。

本报记者 黄辉 本报通讯员 姜涛 摄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河南省三门峡市人民检察院创新学习形式,体会革命先辈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图为该院部分女干警一针一线绣党旗,接受思想上的洗礼。

本报记者 赵红旗 本报通讯员 王飞 摄



4月23日,云南省德宏边境管理支队木康边境检查站民警到辖区结对帮扶家庭走访慰问,为他们送去资助金和慰问品。

本报记者 杨晋峰 本报通讯员 田洪涛 摄